图书情报工作
第63卷 第1期 2019年1月

# 数字时代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

张斌[1,2] 杨文[1] 李子林[1]
[1]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2 [2]数据工程与知识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872

**摘要**：[目的/意义]构建数字时代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培养的新模式，有利于优化档案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理念、途径、方式和方法，从而增强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在数字时代的竞争力，更好满足国家档案事业在数字时代的建设与发展需要。[方法/过程]分析数字时代档案工作的新变化及其档案学专业研究生教育面临的新环境和新问题；从思想理念、体制机制和过程方式层面，探讨数字时代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构建及优化。[结果/结论]提出基于数字时代的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路径，包括更新培养目标、调整培养方向、优化知识结构和创新培养方式。

**关键词**：数字时代 档案学 研究生 培养模式
**分类号**：G270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19.01.022



## 1 引言

自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计算机、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催生了一个全新的数字时代——一个信息的存在方式正在越来越趋向于数字形式，并以数字技术作为运作规则的时代。数字时代使原来以直接感触性或实存性为前提的存在物，逐渐被非直接感触的电子信号或数字编码替代，不断拓展着人们对真实世界的认知能力[1]。数字时代的到来，导致信息的生成、存在、运行和管理方式发生重大变化，这直接给传统档案工作和档案管理者带来了极大挑战。如何做好数字时代的档案工作，成为摆在档案管理机构及工作者面前的一个新命题。《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信息技术发展将档案推到政府治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位置，在此环境下，如何适应当前信息技术发展加强电子档案管理、如何适应现代化管理打造复合型人才队伍，正日益成为我国在新形势下档案工作面临的主要挑战，为了到2020年初步实现“以信息化为核心的档案管理现代化”目标，要“创新和加快档案课程和教材体系建设，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课程和教材体系”[2]。这对培养高学历和高素质档案人才的档案教学和科研机构提出新要求，即基于数字时代的各种变化及其对档案工作的要求，必须要持续优化档案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理念、体制机制、途径、方式和方法等，增强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在数字时代的竞争力，从而更好满足国家档案事业在数字时代的建设与发展需要。这已经成为当前档案学专业教育和改革发展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有从宏观视角对我国档案学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整体发展态势进行的研究，集中在其发展阶段、现状、存在的问题及挑战的梳理等方面[3-6]；有基于大数据和“互联网+”视角，提出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创新与教育教学变革策略的研究[7-9]；有从 iSchools 等国际新型信息人才培养视角，提出对我国档案学专业人才教育的启示研究[10-12]；有基于跨学科、档案工作实践和社会需求等视角，开展的档案学专业教育的跨学科培养模式、联合培养模式、教育改革方向和发展战略的探讨等[13-16]。这些研究成果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层面分析研究了档案学专业教育及人才培养面临的种种问题及对策，为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与借鉴。然而，这些研究对于宏观信息背景——数字时代及其环境下的档案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研究比较有限，尤其是鲜有专门探讨基于数字时代的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研究成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环境下政务信息资源归档和管理研究”(项目编号:17ZDA293)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张斌(ORCID:0000-0001-5832-978X)，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zhangbin@ruc.edu.cn；杨文(ORCID:0000-0002-7459-4134)，博士研究生；李子林(ORCID:0000-0002-1784-1530)，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8-10-30 修回日期:2018-11-14 本文起止页码:153-159 本文责任编辑:杜杏叶

果，这给本文留下了继续深入探讨的空间。因此，无论是基于对国家档案教育政策的贯彻落实、对档案工作实践发展的现实需要，还是基于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补充与完善，本文均期冀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此有所贡献。

## 2 数字时代档案工作及档案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变化

### 2.1 数字时代档案工作环境的快速变化促使档案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要应时调整培养目标

在数字时代，信息主要以数字编码和电子符号的形式存在，而数字技术则成为维持这些非直接感触存在的规则。数字时代的到来，直接导致社会各种信息资源的生成、存在和管理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此背景下，作为档案学研究对象的档案和档案管理活动，以及作为社会信息系统组成部分的档案信息系统也正在伴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经历着一场变化，这些变化直接给档案工作环境带来极大冲击，因为数字时代让原来档案工作中主要依附物理环境的各种实体档案业务管理活动，变得更加动态化、复杂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档案馆形态逐渐由传统型档案馆向数字型档案馆转变、档案保管方式逐渐由集中统一保管模式向分布式的保管模式转变、档案管理内容逐渐从物理管理为主向逻辑管理为主转变、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逐渐从各自为政向信息一体化方向转变、档案服务工作的重点逐渐由对档案实体的传递向档案信息的传递转变、档案保护内容逐渐从重点保护档案载体向重点保护档案信息转变、文件与档案管理方式逐渐从两段式管理向文档一体化管理转变[17]。在此背景下，传统档案学专业研究生的教育和培养目标亟需做出调整。具体而言，就是在培养目标上，要把培养合格档案工作者的身份特性逐渐由传统的保管员向高素质的档案管理者、信息管理者和知识管理者转变；在培养定位上，要把培养懂传统档案管理的档案人才，向培养懂现代信息管理与技术的复合型档案人才转变。

### 2.2 数字时代档案管理对象的日益丰富倒逼档案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要及时优化培养内容

数字时代的到来导致档案管理的对象逐渐由可触的实体性存在转向虚拟的数字化存在，且呈现出来源多元、类型多样、内容丰富、数量成倍和技术复杂等一系列特征，这与传统档案管理对象相比，存在明显差异。从档案载体的角度来观察，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从结绳刻契到甲骨档案、金石档案、缣帛档案、简牍档案。从公元105年东汉蔡伦发明纸张，到公元404年，豪族桓玄颁令停止使用简牍，他在诏令中说："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至此，纸最终完全取代了简牍，成为国家文书的正式书写材料，出现了纸质档案[18]。在这以纸代简的300年间，书信和书籍最先使用纸张，其完成时间在东汉末年，官文书以纸代简要迟缓一些，至东晋才告完成。其中，案牍文书、簿籍文书分别在西晋和东晋实现了转变。而数字时代，我们将面临新的数字记录载体替代传统的纸质载体。这直接导致档案的管理对象由纸质档案向电子文件转变。在当前信息技术日益精进，且已广泛嵌入政务和社会活动的环境下，"电子文件日益增多，文件管理与业务活动的联系更加密切，其真实性保障更加复杂，电子文件管理需要同时满足行政管理、生产管理、业务管理等管理活动过程控制和永久保管真实记忆的双重要求"[19]。现实的变化直接倒逼档案学专业研究生教育和培养内容的改革，即要在传统的档案教学中融入更多的电子文件管理和信息化建设的内容。从当前档案工作的实践来看，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培养内容的变革与丰富已迫在眉睫。

### 2.3 数字时代档案资源管理方式的更迭要求档案学专业研究生教育顺时更新培养理念

数字时代档案管理对象的变化决定了档案资源管理方式的变化。从档案管理工作视角来看，档案资源管理包括档案资源的收集、保管和开发利用，数字时代的档案资源主体主要表现为数字形式，较纸质档案而言易于复制、迁移、共享和传播，因此，数字时代的档案资源管理方式势必与传统纸质实体档案资源的管理方式有较大不同，譬如，档案资源由简单整理向深度加工增值转变，由传统定期处置向实时、动态管理转变，由传统的整理、编纂、编研向资源的深度挖掘处理转变等[7]，其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档案管理理论由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向文件连续体理论过渡。早在2001年，中国人民大学就曾在北京主办了主题为"21世纪的社会记忆"的中国首届档案学博士论坛，如何管理好网络环境下的新生电子文件便是大会的主题之一[20]。如今，十多年时间已经过去，数字时代也已名副其实，数字化档案资源与传统纸质档案资源的数字化存量与增量较当初而言，在整个社会信息资源中占据了更大的比例，并已经成为治国理政和服务社会的重要基础。2014年，《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以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为主导、各行业主管部门密切配合、档案馆(室)集中统一管理的档案资源

张斌，杨文，李子林. 数字时代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2019,63(1):153－159.

管理架构,科学整合档案信息资源,从而进一步推动档案资源科学配置和高效利用[21]。这些举措主要是为了调整和优化档案资源的管理与开发方式。如今,随着数字时代社会对高质量信息的需求日益增长,这对档案信息资源的深度开发利用,以及档案信息资源的社会共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数字时代要求档案资源管理从封闭走向开放,进一步加快建立健全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和方便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从面向政府服务走向面向社会服务,发挥档案资源更大的社会价值,如建设城市记忆项目、开展档案珍品展览、开发基于档案的文创产品等;另一方面,数字时代要求加强信息化建设,通过开发和利用档案信息资源参与国民经济建设发展,助推党和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成为新趋势,譬如,在国家"放管服"改革的背景下,档案资源在浙江省的"最多跑一次"和上海市的"一网通办"工作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数字时代档案资源管理方式的变化,对档案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理念提出了新要求,要求档案学专业研究生教育必须根据档案学专业在数字时代的发展,切实分析和研究档案学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以确保档案专业研究生教育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档案学专业人才的需要。

### 2.4 数字时代档案人才素质的多元需求要求档案学专业研究生教育合理调整培养计划

由于档案工作环境、管理对象,以及管理方法和技术的变化,社会对档案学专业人才的需求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即对高层次、复合型、创新型、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对档案学专业研究生的需求也日益增加。档案是任何业务活动的原始记录,数字时代的档案管理活动已经广泛地融入到政府和企业的业务管理流程,成为其业务管理流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不同行业对档案人才的需要各不相同,根据笔者依托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我国档案学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对 26 家省级档案局(馆)、20 家党政机关以及 23 家大型国有企业等典型用人单位需要的档案学专业人才类型调查统计发现,档案局馆最需要的人才为研究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党政机关最需要的人才为技能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企业最需要的人才为复合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此外,用人单位还对档案学专业人才的工作能力提出要求,按其重要性由强到弱依次为:保密意识及档案职业道德、档案业务指导能力、团队精神和沟通能力、工作整体规划能力、档案学专业理论水平、档案学管理操作技能、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多学科背景等[22]。档案事业和社会发展对档案人才需求的是档案学专业研究生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出发点,直接关系到是否能确定科学合理的培养计划、课程体系、评价指标体系等。早在 1998 年,为了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教育部就将原来隶属于历史学的档案学专业划归管理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并列。如今,按照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的建设确定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方向和课程体系,已经成为许多高校的重要选择。因此,为适应数字时代社会发展和学科调整要求,保证和提高档案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有必要重新审视用人单位对档案人才的多元需求,以及档案学专业教育体系、学科体系和理论架构,并据此调整档案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计划。

## 3 数字时代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构建及优化

在数字时代,我们要适应发展变化,重塑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所谓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指一整套反映档案学专业研究生人才培养规律的教育教学思想理念、教育教学管理体制机制、教育教学过程与方式的集合,可以用公式把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表示为: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 = 思想理念 + 体制机制 + 过程方式。面对数字时代档案工作的变化及其对高学历高素质档案人才的迫切需求,构建和优化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尤为必要。

### 3.1 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培养理念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和社会对档案信息资源管理和开发利用的新要求,现代档案工作的内容范围比传统档案工作大为拓展,档案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理念需要根据现代档案工作领域和工作方法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从现实发展来看,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培养理念主要涉及研究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特别是档案事业发展对档案学研究生的需求,档案学专业研究生的人才定位,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培养的模式理论,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培养的核心理念等。譬如,数字时代面对不同学科的融合,档案学科的学科内容拓展与学科特色保持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显现,文件、档案管理与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系统越来越高度融合,相关研究相互渗透,如何在做好融合教育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档案学专业的学科特色是亟待关注的问题;此外,随着数字时代电子文件的增多及发展应用,档案工作不再局限于电子文件与档案信息管理本身,需要关注文件在电子环境中流转时,业务系统保留的各项管理数据的原

始记录和相关隐形知识；档案工作范围将不仅仅限于文件归档后的“档案管理”，其研究触角将拓展到文件形成之初，文档一体化管理将“文件档案运动的全过程及其管理”纳入档案工作领域。这些都是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培养理念层面亟需考虑的问题。

### 3.2 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培养管理体制机制

研究生培养工作的管理体制和机制主要以服务和保障为重要特征，主要强调服务，是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的服务型管理，重在为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培养创造宽松、优化的环境氛围，而不是过分约束和管制。在数字时代，档案学专业研究生的教育和培养环境已经发生变化，在这种新环境下，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培养管理体制机制构建，必须要改变过去约束和管制的培养方式，以现代教育学理论为基础，以数字时代档案工作的变革为契机，以满足现代社会对高学历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多元需求为牵引，加大对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的支持力度，不断优化档案学学科体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亟需深化档案学专业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在研究生培养中更加重视服务职能，要通过培养体制机制的优化，为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培养配备更好的师资、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搭建更好的学习交流平台、拓展学生的未来职业空间，以及营造更好的学习氛围等，从而为培养符合数字时代需要的高学历高素质的优秀档案学专业人才提供和创造更好的环境。

### 3.3 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培养过程与方式

档案学是适应人类社会发展对文件和档案进行科学管理的需要而形成的一门应用性比较强的学科，而文件作为各项业务活动的工具，从来就与各类机构的管理活动密不可分[19]。在数字时代，从档案人才需求侧来看，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档案馆、社会公众等用人主体，所需档案学专业高层次人才的知识、素质和能力的侧重点会有所差别；从档案人才供给侧来看，由于学生自身的特点和兴趣爱好各不相同，适于培养的档案人才类型也各不相同，譬如，有的适合作为档案学术研究型人才培养，而有的则适合作为档案管理实践型人才培养[23]。由此可见，数字时代档案学专业研究生的需求与供给均有不同。为此，结合档案人才的供给侧，尤其是档案人才的需求侧，及时优化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培养过程与方式十分必要，具体涉及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培养质量标准的设定、培养方案的设计、课程体系的规划、教学内容的设计、教学环节的选择、教学方法的改革、教学质量管理体系的建设与实施等。以上这些内容，都是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培养过程与方式亟需优化的问题。

## 4 数字时代下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创新

### 4.1 立足数字时代更新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培养目标

数字时代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培养目标，要从培养合格的档案保管员向以培养优秀的档案管理者、信息管理者和知识管理者转变。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克站在档案工作者的视角，就档案工作未来面临的信息化发展形势，提出了“后保管模式”理论。该理论是针对档案工作长期以来以实体管理为中心的“保管模式”的进一步发展与变革，逐渐受到档案界的认同与推崇。“后保管模式”实质上是“将传统理论对实体对象实态文件的关注转变为对文件、文件形成者及其过程的有机联系、目的、意图、相互关系、职能和可靠性的关注”[24]。这种认识促使档案管理者的职能发生了调整和变化。同时，也由于当前新兴信息技术在档案业务和管理中的广泛应用，档案智能化管理平台使档案管理者逐步摆脱了繁重的档案实体管理事务，极大地简化了工作程序，提高了工作效率。因此，档案管理者可以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对档案信息资源的深度挖掘及其价值的重新发现，从而实现自身管理职能的价值提升和角色重新定位。正如冯惠玲教授所说：“这种角色转变的要求导致档案人员将职能重心从实体管理转向信息管理、知识管理，这是一种由外向内、由浅入深、由物理控制向智能控制的转变，目的是保证数字时代社会记忆的完整和向人们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和知识服务”[25]。在数字时代，面对存量巨大且增量迅速的数字信息，如何借助先进的信息和数字技术在这些浩瀚的信息资源中发现不同信息之间的关联，从而挖掘有价值的信息链或知识链，则是当前数字时代档案管理者的核心价值所在。而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改变传统以档案整理和保管为核心内容的档案学专业培养模式，构建以知识管理为核心内容的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培养体系。档案本身作为一种不竭的信息资源库，通过这种培养模式的变化，档案管理者应该由过去的档案保管员转变为档案知识的提供者，积极挖掘档案之间的内在联系，将档案加工组织成价值更高的知识或信息服务产品，从而更好的为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活动提供智力支持[26]。

### 4.2 立足数字时代调整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方向

档案学专业的教育目的主要是为培养熟练掌握现代档案管理理论与信息技术，可胜任文件管理、档案管

理、信息管理、知识管理等工作的高级复合型高素质人才。目前,就研究方向而言,不同学历层次的研究生培养方向各有不同。从国家层面来看,国务院颁布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要推动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对专业学位和学术学位开展分类培养。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出,要严格遵循研究生教育规律,根据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研究生培养要求,分类改革选拔方式和培养模式。本研究所指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包括博士生和硕士生,硕士生又分为学术学位硕士生和专业学位硕士生。数字时代的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培养可以按国家关于研究生培养的文件要求,实现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分类培养,即按照学位类型分方向培养。对于学术学位的研究生(包括博士生),主要侧重学生的学术研究和创新能力培养,要不断优化档案学科体系,创新教育教学内容,增强档案学理论研究与方法训练,要根据数字时代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尤其是针对档案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重点围绕现代档案管理理论与信息技术培养学生,加强过程管理和考核,确保培养质量,最终满足政府信息化、企业信息化、国民经济信息化、社会生活信息化发展需要的档案学理论人才和专家。对于专业学位的研究生(主要为硕士生),则侧重学生实践能力培养,要与业务实践部门建立联合培养机制,积极探索开放式培养模式,建立社会实践学分认证制度,结合承担政府、行业、企业实际项目,加快培养能够解决档案管理业务活动中实际问题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与应用型人才。



## 4.3 立足数字时代优化档案学专业研究生知识结构

为适应数字时代对档案学专业人才提出的多元需求,档案学专业研究生知识结构需要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具体可以按照“宽口径、厚基础、重应用”的原则进行优化。一是以“宽口径”为指引,致力培养学生的跨学科知识综合能力。档案学本身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可与多个专业和多个社会行业与领域进行深度交叉融合,实现优势互补,而数字时代愈加放大了这一特性。数字环境下,档案现象、档案活动、档案工作的日益多元化与复杂化,为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提供了良好的外在融合与优化环境,从专业特性到人才培养,档案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也需要结合历史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新闻学、信息技术等多学科,拓宽其知识结构,将相关学科知识与档案专业知识进行有机结合,满足档案局馆、党政机关和企业等主要用人单位的复合型人才需求。二是以“厚基础”为指引,夯实学生的档案学专业基础知识。在当前数字环境和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融合发展的双重背景下,档案学专业研究生教育应以国家信息化为契机,关注社会信息活动变化和档案业务活动的需要,一方面要继续坚持实施信息资源管理的大口径式培养,增强档案学专业研究生未来就业的弹性;另一方面,无论时代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档案及其管理的本质不会变,因此更要守好档案学专业的基础,强化档案专业的独有特色,巩固档案学专业基础课程教学,明确与图情相关专业之间的边界,要在适应数字环境下档案事业建设发展的基础上,立足新时期档案工作的特点进行改良与创新,合理设置档案信息和技术课程模块,促进档案与信息技术的融合,从而进一步提升档案专业人才对新型档案工作、档案规律、档案现象及其相关问题的把握与适应能力。三是以“重应用”为指引,提高学生知识融合与应用能力,“重应用”即提高档案学专业知识的社会功能,将学术知识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型知识。为此,要关注档案工作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拓展档案教育教学深度和广度,基于档案应用和实践,丰富和完善已有的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培养体系;在课程设置方面,增加案例教学,适当引入实践操作性的档案课程,与企业档案部门、档案馆共建档案专业教学实习基地,将“文书学”“现代组织信息管理”等课程的课堂“搬到”实践部门,还原实际业务工作场景,以问题为导向开展档案教育与知识传递[27]。

## 4.4 立足数字时代创新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方式

档案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和应用性比较强的管理科学,随着信息技术在档案工作中的广泛应用,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方式不能延续只重视传统档案管理理论与方法的教学和培养思路,而要兼顾档案管理理论与技术问题的统合,关注先进技术在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及其带来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为此,在档案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方式上,需要注意理论与实践,学术与业务的有机关联,逐步构建“实践式＋研究式＋联合培养式”的三位一体的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方式,从而满足数字时代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对档案人才的需求。一是培养实践式档案人才,丰富档案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包括业务技能训练体系、社会实践锻炼体系、创新能力提高体系等[28],即在研究生受教育和培养期间鼓励学生参加国内外的专业实践活动,到相关部门如档案馆、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企业进行实习锻炼;鼓励学生参加以提高创新能力和业务能力为导向的档案

学科竞赛和科技创新活动，将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相结合，以培养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二是培养研究式档案人才，即以学术研究活动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在研究生学习期间，鼓励和支持研究生参加校内外的学术研究项目、学术会议等活动；在博士生、硕士生课程教学中，采取多学科老师联合授课与同学参与教学相结合的方式，邀请一些已经毕业的博士或硕士回校与在校生讨论和交流经验；完善研究生培养的项目资助，鼓励学生对档案学专业相关理论和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邀请国外专家开展专业讲座，提升对前沿问题的认识；同时，适度提高和扩大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攻读研究生学位的比例。三是开展联合培养式教育，培养具有宽广视野的档案人才，这种培养模式是指双方或者多方一起培养研究生的教育模式，档案学专业研究生联合培养主要是指构建“校档结合”“校企结合”“校政结合”“校校结合”的研究生联合培养方式，学校可以通过和档案局、企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其他高校通过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建立双导师制度等措施共同培养档案专业人才。在此培养方式下，学生可通过不同学习体验，全面学习、接收各种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知识，夯实档案理论，提升业务技能，满足数字时代社会对复合型档案人才的要求。



**参考文献：**

[1] 刘友古. 数字时代的本质与未来[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05-02(5).

[2] 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J]. 中国档案，2016(5)：1-1.

[3] 冯惠玲. 创新：档案与文化强国建设——2014 年档案事业发展研究报告集[C]. 北京：中国档案学会，2014：18.

[4] 金波，周枫. 我国档案学专业高等教育的发展、艰辛与责任[J]. 档案学通讯，2018(2)：4-9.

[5] 陈忠海，娄晶晶. 档案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存在问题与对策研究述评[J]. 档案学通讯，2013(4)：74-78.

[6] 王成兴，潘红. 我国档案学硕士研究生教育的现状与思考——从跨专业生源的视角[J]. 档案学通讯，2013(1)：62-65.

[7] 何振，杨文，唐思慧，等. 大数据时代档案学教育的新常态与实践拓展[J]. 档案学研究，2016(1)：117-123.

[8] 金波，蔡敏芳. 大数据时代档案学专业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创新[J]. 档案学研究，2016(6)：12-17.

[9] 杨岚，王小云. 基于“互联网+”环境的高校档案学实践教学研究[J]. 档案与建设，2018(7)：38-41.

[10] 谭必勇，许文迪. 渐进式融合：iSchools 背景下美国档案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状况、趋势及其启示[J]. 图书情报知识，2017(6)：50-59.

[11] 肖秋会，伍黎丹，李珍. iSchool 联盟高校的档案学教育特色及对我国的启示[J]. 档案学通讯，2018(1)：77-83.

[12] 王思诗，沈晓雪. 加拿大档案学研究生教育课程设置分析及启示[J]. 山西档案，2016(3)：100-102.

[13] 唐义. 图书馆学、博物馆学与档案学教育整合：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人才路径[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14 (4)：84-89.

[14] 王巧玲，孙爱萍，谢永宪，等. 建设校外人才培养基地体系创新合作教育平台——以北京联合大学档案学专业为例[J]. 档案学通讯，2013(3)：81-85.

[15] 陈忠海，陈洁. 对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档案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探索[J]. 档案学通讯，2011(5)：45-48.

[16] 张垒. 我国档案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研究[J]. 档案学通讯，2011(6)：43-46.

[17] 黄明忠. 数字时代档案工作的新趋势[J]. 四川档案，2002(4)：6-8.

[18] 周雪恒. 中国档案事业史[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45.

[19] 历阳. 高等学校档案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暨第十届档案学专业系主任联席会议综述[J]. 档案学通讯，2002(1)：76-78.

[20] 姜之茂，马素萍. 为了 21 世纪的社会记忆——中国首届档案学博士论坛学术观点述要[J]. 北京档案，2001 (12)：12-15.

[21]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J]. 中国档案，2014(5)：12-14.

[22] 张斌，马晴，苟俊杰，等. 我国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状况调查分析[J]. 北京档案，2015(4)：11-15.

[23] 张斌，吴琼，马晴，等. 档案学专业创新人才内涵探析[J]. 档案学研究，2015(1)：109-114.

[24] 特里・库克. 1898 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C]//国家档案局. 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报告集.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103.

[25] 冯惠玲. 拓展职能——“夹缝时代”档案职业的生存之策[C]//中国首届档案学博士论坛论文集编委会. 21 世纪的社会记忆：中国首届档案学博士论坛论文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09.

[26] 张斌. 角色变迁：从信息管理者到知识管理者[J]. 档案学通讯，2011(2)：32-35.

[27] 李子林. 我国档案高等教育与在职教育融合发展的需求及策略研究[J]. 浙江档案，2018(4)：13-16.

[28] 王协舟，何振，肖文建. 档案学专业课程体系设计与实践教学改革——以湘潭大学档案学专业为例[J]. 档案学通讯，2006(5)：69-72.

**作者贡献说明：**

张斌：提出论文主题与整体框架，撰写论文；

杨文：收集资料，撰写论文；

李子林：对论文进行补充修改。

张斌，杨文，李子林. 数字时代档案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2019,63(1):153－159.

## Research on the Training Mode of Postgraduate Majors in Archives in Digital Age

Zhang Bin[1,2] Yang Wen[1] Li Zilin[1]
[1] School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2] Key Laboratory of Data Engineering and Knowledge Engineer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Constructing a new mode of postgraduate training in archival science in the digital age is conducive to optimizing the training concepts, ways, methods and methods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in archival science, thus enhanc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archival graduate students in the digital age and better meeting the national archives caus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digital age.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w changes in archives work in the digital age and the new environment and new problems faced by postgraduate education in archival sc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concepts,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and process method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postgraduate training mode for archival majors in the digital age. [**Result/conclusion**] Finally, this paper proposes an innovation path for postgraduate training model of archival science based on the digital age, including updating training objectives, adjusting training direction, optimizing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innovative training methods.

**Keywords**: digital age archival science postgraduate training model